

## 衣带渐宽终不悔

我的文博情  
程存洁

1990年7月我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毕业,分配到广州博物馆工作,从此与文博结缘,至今已有33年。30多年来,广州文博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我也从一个文博新人逐渐成长为一名基层博物馆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路走来,见证了广州文博发展的许多重要时刻,同时也把我的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文博事业。

我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长大的,小时候很少能接触到文物艺术一类事物,再加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需购票才能入博物馆参观,所以读书期间很少去博物馆、艺术馆参观。

毕业后,我很想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后被分配到广州博物馆,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和迷茫。20世纪90年代,文博单位属冷门行业,吸引不了激情澎湃的年轻学子。报到时,得知自己是广州文化系统唯一一名研究生。

领导重视人才,把我分到馆业务部门。按惯例,馆里新入职人员均需去展馆锻炼一年,因我学历较高,馆领导特批我除外。

工作不久,我查阅资料,发现本馆有不少“威武史”。1928年,广州市政府以“广州为孙中山故乡”,启动博物馆建设,次年1月11日,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馆址就设在广州地标建筑镇海楼。这是广东第一座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功能的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在博物馆建设及管理理念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51年2月27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市长兼任负责人,3月1日新成立的广州人民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后改名为广州博物馆)。到我进入广州文博时,广州已建成广州博物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南越王墓博物馆等十余个文博场馆,地上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地下文物也得到了科学发掘,一大批市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纷向馆捐献文物。

得知自己是在一个历史悠久且各项工作都优秀的单位工作,我之前的迷茫和担心立即一扫而光,激情重新燃起。

30多年来,我亲身经历和参与了广州文博的许多大事,如今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

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广州迎来了建城2210周年。广州市文化局从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展览筹备组。我有幸陪陪末座,成为其中的一名陈列人员。

展览设在南越王墓博物馆临展厅,从市属文博单位精选珍稀品以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共计262件(套),按铜铁器、玉石印章、陶瓷器、工艺美术和书画五大类展出。展览推出后,深受观众喜爱,并荣获首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完成该展后,1997年下半年我被调去参加南越国官署遗址发掘工作。在广州历史长河中,南越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

官署遗址位于广州市北京路东侧、中山四路以北地带。早在1975年,考古工作者就在此发现秦造船遗址及叠压其上的南越国砖石水道遗迹,1995年又在该片区东北角发现南越国官苑石水池。为保护原址,考古人员与工地施工人员曾发生过激烈争执,后在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的关心下,矛盾得到解决,遗址得到保护。由此使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二者关系问题,迅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1997年广州计划在此处兴建“信德文化广场”。鉴于这里已有两次重大考古发现,按国家规定,在开展基建前需作考古发掘。为此,广州市文化局成立秦汉造船遗址办公室,从市属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成考古发掘队,作抢救性发掘。该项目被命名为“97广州秦造船遗址发掘II”。

这次考古发掘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探方46个。为确保考古现场不塌方、不渗水,施工队提前在工地四周打下近10米深的支护桩。

发掘工作一直到1998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百余米长的曲流石渠。该石渠建于南越国,气势雄伟,砌法独特,在我国园林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鉴于这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发掘队及时起草《秦汉造船遗址与西汉南越国官署遗址保护初步设想》,首次划定遗址重点保护区及4.8万平方米的遗址保护区,为官署遗址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1995年和1997年开展的两次考古发掘成果,均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处遗址两次获奖,在全国考古界实为少见。如今,官署遗址得到了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2005年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遗址保护专项”,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再次被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候选点。南越国官署遗址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精华之所在”。

自入博物馆工作以来,馆领导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放手让我参加一些重大项目。因工作出色,我于1998年被提拔为副馆长,次年入选广州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组织的“广州市政府培养面向21世纪领导人”项目,赴美国学习一年。自2003年起担任馆长,30多年来,我一直以馆为家,以馆为荣,兢兢业业地工作。

在担任基层领导期间,我先后主持或参与过一些重要工作,如将五仙观下放越秀区,整合广州博物馆与原广州美术馆舍,举办广州博物馆80周年馆庆、修缮文保单位等。

历史上,五仙观是一座祭祀五仙的谷神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由广州博物馆管理。因历史原因,五仙观周边存在安全隐患,馆的确无法推进征地拆迁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文保理念的发展,加上各区都在积极筹建博物馆,为充分发挥区政府优势,1999年正式将五仙观移交越秀区管理。区委区政府接管后,一方面挂牌设立越秀区博物馆,一方面启动环境整治,经过2000年和2004年两期修缮,五仙观的历史风貌得到恢复。2007年,市区两级政府又在此处建成南粤先贤馆,使南粤先贤精神与岭南文化精髓一同融入五仙观中。如今,以五仙观为馆舍的越秀区博物馆,环境优雅静谧,已成为广州一处重要文化中心。五仙观的下放、保护、利用,为全市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树立了榜样。

广州博物馆一直以镇海楼为馆舍,展示空间狭小,严重制约了馆的发展。后来广州美术馆新馆落成开放,毗邻镇海楼的原美术馆馆舍在局的努力下交由博物馆统一管理。2006年,我开展馆舍整合工作,后经反复论证,决定凭借公园环境美的优势,通过连通两处馆舍,使其成为花园型博物馆。

整合工程虽然不大,却十分琐碎。整合后的广州博物馆,功能分区更为合理,展示空间增大数倍,馆藏文物得到更好展示,广州博物馆集历史、自然、艺术于一体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定位得到初步实现。

2009年,广州博物馆迎来80周年华诞,5月16日盛大的庆典活动在镇海楼前举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专程到馆庆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女士寄来贺联:“羊城无尽藏,镇海多奇珍。”

此次庆典还有意外收获。活动期间,我向郑院长展示馆藏1937年版《故宫日历》。院长非常兴奋,回去后马上安排人员查找馆藏,并决定继续出版《故宫日历》。从2010年起,故宫每年都出版一款《故宫日历》。如今《故宫日历》已成为故宫最受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文博工作的30多年里,除上述这些令人难忘的“大事”外,我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主持修缮了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三元古庙”、广州大元帅府旧址等;与港澳文博同行合作办展,系统征集广州外销瓷、外销画、玻璃窗等地方文物千余件。

文博是我一生唯一的事业,我愿为之坚持不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广州文博取得了的成绩,全体广博人,也包括我自己,为此付出了无数辛勤汗水。为使广州文博能更上一层楼,我们要更加努力。

(程存洁著《品味·印迹》文物出版社 2023年7月)



虢国是两周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姬姓诸侯国。从分封到消亡,正处于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期,也是礼乐制度从萌芽走向成熟时期。虢人极为推崇食器,特别是青铜鼎,承载着身份、等级、礼仪、文化等多方面内涵,是西周礼器组合的核心,是奴隶主贵族明尊卑别贵贱的标志器物。虢国青铜鼎存世的数量多、类型全,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鼎文化,为了解两周时期的礼器组合制度和用鼎规范提供了珍贵资料,今特选数件介绍如下,以供读者。

师鼎(图1、2) 西周中期器,通高85厘米,口径65厘米,最大腹围205厘米,重106千克,1974年扶风县强家村铜器窖藏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鼎口微敛,平沿外折,双立耳,耳外侧有两道凹槽。口沿下侧为几匝粗细不一的凸弦纹,其间还饰有两周云雷纹。整只大鼎,造型规整,制作精良,敦实稳重,雄伟大气,尤其是腹内壁的长篇铭文令其价值倍增。鼎腹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197字。全篇铭文有七处提到德,有孔德、安德、胡德、烈德、懿德、介德,是西周铜器提到“德”的最多的一件。从铭文我们还知道器主师属于虢国贵族魏季一支,西周中期时受周王宠信,连续四代担任师职,位高权重,赫赫有名。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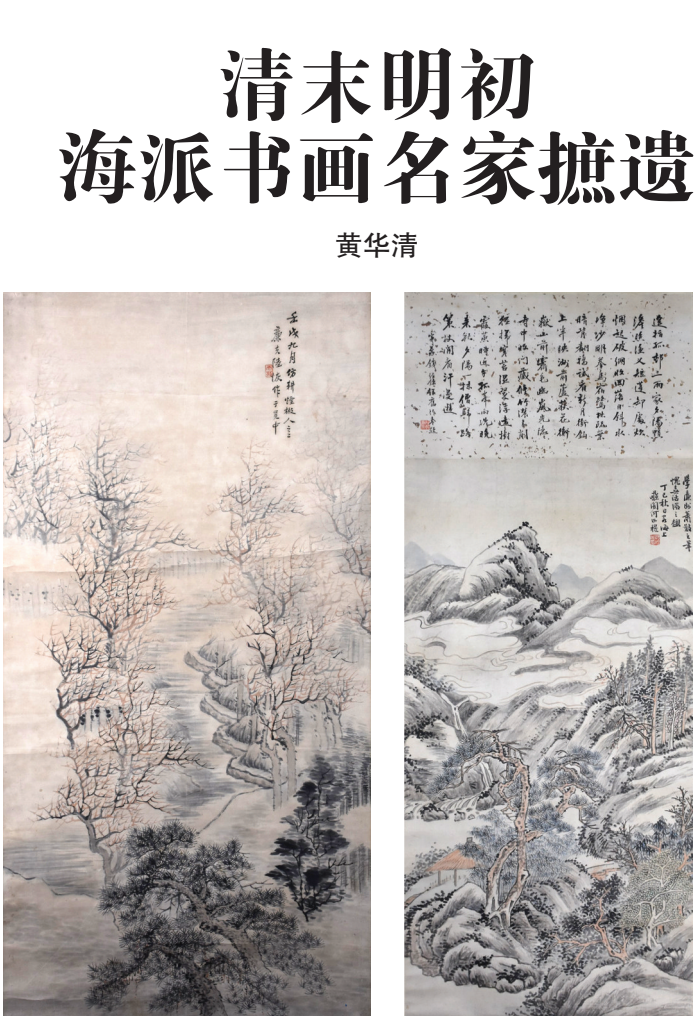


图3



图4



图5



图6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通商,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产生了维新思想。上海成为经济中心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文人画家纷纷云集此地。受新的社会环境影响,文人画家参考东西方艺术技法和理念,对传统国画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以顺应时代生活气息,形成著名的“海上画派”。海派画家在传统国画现代化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一提到“海上画派”,大家熟知的便是“海上三任”、蒲华、虚谷、吴昌硕等知名大家。而对近代画史稍有研究还会发现,清末民初之际有一批晚清“遗老”在海派书画艺术苑活动,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他们在书画笔墨、风格、流派传承上,对张大千、刘海粟、徐悲鸿等大批近现代艺术家产生过深远影响。

其实,“海上画派”的知名人物远不只这些,除了我们熟悉这些大师外,当年还有许多“名流”。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至1949年间,至少有1480余位画家在上海谋生,进行书画创作活动。其中有不少人名擅一时。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江西省各博物馆收藏了不少海派书画家作品。江西省文物交流中心20世纪80年代从上海朵云轩购进的书画中,就有数位是清末民初近代海派名家的珍品。有光绪至宣统年间的“城隍庙画派”代表画家邓启昌、舒浩,有南派山水画扛鼎人物何汝穆、顾麟士、陆恢,还有海派名家陆恢、姚虞琴,民国海派著名花鸟画家吴树本、谢公展(与缪伯英号称“海上三菊”)等。下文选取其中几位名家及其作品加以介绍。

“城隍庙画派”代表画家:邓启昌 字铁仙,号跛道人,江宁(今南京)人,晚清画家,生卒不详,约与钱慧安、倪田同时。其作品有时署名邓启品。侨居上海,光绪年间在上海以卖画为生,与当时海上名家多有交往。工画花卉,尤善画菊,笔力精劲,设色绚丽。

邓启昌的《菊花图》纸本立轴(图1) 纵138厘米,横37厘米,没骨画菊、篱、红叶荆棘。款题:“抚十三峰草堂,铁仙邓启昌写于飞鸿馆。”铃朱、白文名字两方印。十三峰草堂为清代中后期画家张锡宁书斋,以气韵取胜,“海上画派”前辈大师虚谷曾取法张锡宁。可见邓启昌此画为仿张锡宁之作。

## 国之重器

—虢国青铜鼎鉴赏



图1、2

图3、4

图5、6

虢文公子段鼎(图3、4) 西周晚期器,通高28.9厘米,口径31.4厘米,现藏辽宁旅顺博物馆。此器平沿方唇,立耳,半球形腹,底近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波曲纹,间隔以弦纹。耳外侧饰重环纹。腹内壁有22字铭文:“虢文公子段作叔妃鼎,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同铭器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法国巴黎赛尔诺什博物馆也各藏一件,它们的形状、纹饰、铭文都相同,应是一组列鼎。铭文中的“段”是作器者,魏文公的儿子,“叔妃”是“段”的妻子,排行为叔,反映了西周晚期虢国与姬姓亦国联姻这一事实。

魏宣公子白鼎(图5、6) 西周晚期器,通高33、口径32厘米。现藏北京颐和园管理处。平沿方唇,立耳,半球形腹,三蹄足。颈饰窃曲纹,腹饰鳞纹,间隔以弦纹。鼎内壁铸铭文5行27字:魏宣公子白作尊鼎,用即享于皇祖考,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此鼎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魏季子白盘关系密切,魏宣公子白与魏季子白二者应为同一人。魏宣公是西周晚期虢国的一位国君,魏宣公为其死后谥号,魏季系其氏,其子

白是一名军事将领,伐豳狄立功得到周宣王赏赐,表明魏公一支,世在王朝任高级武职。

从上述所列器物看,虢国青铜鼎是两周之际鼎文化的一个缩影。从纹饰看,主要有波曲纹、重环纹、垂鳞纹、窃曲纹、凸弦纹等,纹饰风格从早期的繁缛华丽变得素雅疏朗、质朴简练。从器形看,都是圆鼎,附耳或立耳,半球形腹,蹄足,造型古朴、庄重大方。从铭文看,大多都简明扼要,明确作器者、为谁作器以及希望后世永保用享。从组合看,多为列鼎,魏国贵族严格遵循用鼎制度,其中,国君及魏国太子墓均为七鼎,国君夫人礼降一等,使用和大夫一样的五鼎,其余的士级贵族使用的是三鼎或一鼎。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器皿。经世代薪火相传的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鼎的庄重、沉稳、坚实、优美,深受人们喜爱。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钟鸣鼎食、问鼎中原、革故鼎新、大名鼎鼎等一些成语已经被人们烂熟于心。1995年10月,为庆祝联合国五十年华诞,我国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青铜巨鼎——世纪宝鼎,更是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人期望稳定、安宁、和平的理念。

清末民初  
海派书画名家撷遗

黄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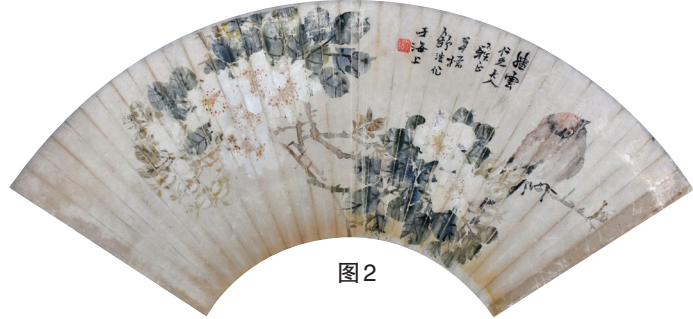


图2



图3



图5



图6

“城隍庙画派”代表画家:舒浩字萍桥,浙江宁波人,侨寓沪上,生卒不详。与任伯年、沙馥、钱慧安同时,画名亦相伯仲。光绪宣统年间与钱慧安、邓启昌、倪田、宋海卖画海上,号为“城隍庙画派”代表画家。能诗、山水、人物、花鸟兼善,尤擅勾填填彩,人物与陈老莲、任伯年近似。

舒浩的《水墨花鸟图》纸本设色(图2) 纵18厘米,横53厘米。款题:“继云仁兄大人雅正,平桥舒浩作于海上。”铃白文字号“平桥”方印。

清末民初江南山水画家代表:陆恢(1851—1920)初名友恢、友奎,字廉夫,号狷斋、井南旧客、破佛龛主、话雨楼主、狷斋、丑奴龛主,江苏吴江人,寓居苏州。善画山水、人物、花鸟,工汉隶,为吴大澂赏识,得观历代名迹,入吴幕府游三湘,并从军出关,饱览辽东名胜。后助江督张之洞补绘《承华事略》。所作山水苍秀迢迢,古拙幽雅,为娄东嫡传;花卉清逸有致,得恽寿平遗韵。又精鉴别,曾先后为庞莱臣(虚斋)及盛宣怀鉴定古书画。为清末民初江南山水画一代宗师,从游者数十人。

陆恢名款《秋溪寒林图》纸本中堂(图3) 纵132厘米,横66厘米。款题:“壬戌秋仿耕烟散人意,廉夫陆恢作于吴中。”画面铃有收藏印(朱文字号“天放”方印)。画为写意水墨山水,部分落叶秋林枝柯赭黄写之。款题提示仿王翬笔意。

海上山水画扛鼎人物:何汝穆(1874—1921或1923)字熙伯,别号洗鉢,浙江人(或为安徽人)。寓居上海鬻画为生。曾任职上海牙厘局馆(税收、招商局)。工书、能诗,善传统山水,摹古功力深厚。与蒲华、顾麟士、陆恢、吴昌硕等相交,尤其与一代宗师吴昌硕交厚。其画作存世不多。

何汝穆的《拟王鉴笔意山水图》纸本立轴(图4) 创作于1917年,摹清初王鉴画意。纵132厘米,横52厘米。款题:“学廉州萧散之笔,愧无活泼之趣。丁巳秋日客海上,融口何汝穆。”铃白文“汝穆私印”方印。诗塘裱线钱铭所题旧作诗稿。钱铭为江苏无锡人,是吴昌硕、王一亭的好友,著名的书法家、师法初唐四家,尤其是欧阳询。

清末民初四大鉴定家之一:姚虞琴(1867—1961)名瀛,字虞琴,渔吟,号景瀛,浙江余杭人,久

居上海。早年科举未第,潜心习诗作画,50岁寓居上海后与画家陈夔龙、程十发、唐云、吴昌硕等交往甚密,诗歌酬唱。喜写兰,其兰由明入元,幽静秀润,与齐白石有“北齐南姚”之誉。抗战期间蓄须深居,卖画度日,学郑思肖,画兰不帶土,寓祖国沦陷之意。喜收藏,精鉴赏,与吴湖帆、黄保钺、张大壮并称“四大鉴定家”。

姚虞琴的《墨兰图》纸本立轴(图5) 纵66厘米,横32厘米。款题:“美人称绝世,微笑摘兰簪。庭中光景媚,叶叶度春风。壬午春虞琴写生,年七十六”铃白文“姚虞琴”方印。壬午年为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期间,所以此兰为空中悬浮兰。

海上三菊:吴树本(1869—1938年),字笠仙,号餐英阁主、秋圃老农、东篱野叟等,江苏扬州人。擅人物、山水、花鸟,工诗、篆刻。中年后主画菊花,在恽寿平“没骨法”的基础上,重彩小写意,以色画花,以墨点叶,造型优美,明丽热烈,突破文人画的冷逸风格。同缪谷英、谢公展并称“海上三菊”。

吴树本的《荣耀秋菊图》纸本轴(图6) 创作于1930年,纵87厘米,横40厘米。款题:“重阳有约,风雨归来,荣耀秋菊,花好齐开。十九年冬月笠仙吴树本”铃朱文“吴树本”、白文“笠仙写菊”方印。

(江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藏品)

<b>科技保护</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li></ul>	<b>MicroWise System</b>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b>科学管理</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li></ul>	
<b>创新服务</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li></ul>	<b>遗址</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博物馆</li><li>发掘现场</li><li>档案馆</li><li>图书馆</li><li>旅游景区</li></ul>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联系人:张总 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9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